游四方闯天下

——明清时期徽州人才产生的第二条道路

赵华富*[1]

【摘要】: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徽州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传统受到重大冲击。大批读书人“弃儒服贾”，农民成帮“弃农经商”。他们“走四方”，“闯天下”，不但在异地他乡经商业贾，而且还在异地他乡培育人才。因而，徽州除了在本地培育人才之外，在异地他乡产生了第二条育才道路。明清时期，徽州不仅绝大多数富商大贾都是在第二条育才道路培育成长，而且还有大批进士和官宦产生于异地他乡。

【关键词】:人才；移民；科举；进士；徽商；徽州

【中图分类号】:K29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18)02－0001－06

徽州名宗右族绝大多数都是“中原衣冠”的后裔，尊孔读经、重教崇文、经学传家是他们的历史传统。他们认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亢宗亢族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教育，重视人才。

明清时期，徽州人才的产生和成长出现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在本地，即徽州一府六县的家塾、书院和府县学；第二条道路在异地他乡———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家塾、书院和府县学。这一社会现象特别引人注目。本文主要阐述徽州第二条育才道路的产生和在异地他乡培育的进士和官宦、富商大贾。

一、徽州第二条育才道路的产生

宋元时期，徽州人大都是亦耕亦读，聚族而居，固守家园，“人重去其乡”[1]。明代以来，特别是到明代中期，商品经济日益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思想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和巨大冲击。弘治、正德以来，由于人口大量增长，耕地严重不足，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归有光说:“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2]康熙《休宁县志》卷七《奏疏》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人，寄食于农，徽民寄命于商。”

明代中期，徽州商人“走于四方”，“足迹几半宇内”[3]，“安土重迁”的历史传统和历史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徽州人口纷纷向全国各地迁徙，他们侨居全国各地，成为异地他乡的寄籍百姓。《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四《原姓》说:“盖吾新安多无田以治生，故人往往弃本就末，糊口四方，久则聚庐而处。或祖、父初出，子孙遂忘所由来；或身居富贵，置先人于不顾，比比也。”徽州人向全国各地迁徙，大都由农村迁居城镇，这是徽州人向外地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而去。甚至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廖腾煃《海阳纪略》卷下记载:“休宁巨族大姓，今多挈家藏匿各省，如上元、淮安、维扬、松江，浙江杭州、绍兴，江西饶州、浒湾等处。其祖、父丁粮，概行寄托穷亲，当役应卯，不免遭其吞蚀，及乎征比，仅余皮骨，法无所施，以致钱粮多不清。”

[1]**作者简介**:赵华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安徽合肥 230039)。

据历史文献记载，徽州人移民人口较多的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城镇，如汉口、武穴、南昌、景德镇、安庆、芜湖、江宁、镇江、仪征、扬州、淮安、苏州、杭州、绍兴、湖州、嘉兴、松江、上海等地。南方的广州，北方的北京、临清，徽州移民也很多。明清时期徽州在全国各地有多少移民，没有留下统计数字。但是，从三种社会组织的产生，可以看到一斑。

(1)府籍同乡建立的社会组织。据历史文献记载，明代中期徽州移民即在许多城镇先后建立了“新安会馆”，如临清新安会馆、南京新安会馆、汉口新安会馆、广州新安会馆、乌程县南浔镇新安会馆、秀水县濮院镇新安会馆、归安县菱湖镇新安会馆、德清县新市镇新安会馆、德清县唐栖镇新安义所、长兴县四安镇新安公所，等等。这些新安会馆的建立，说明这些城镇徽州商人和徽州移民已经很多。江登云《橙阳散志》卷三《士林》记载:“(江亢宗)尝客苏州，乡人建新安会馆，君董厥事，公慎无欺，人多称焉。”

(2)县籍同乡建立的社会组织。从明代中期开始，徽州移民以县籍同乡为纽带建立的社会组织，在全国各地许多城镇出现。如北京歙县会馆、休宁会馆、绩溪会馆，南京歙县会馆、新歙会馆，上海歙县会馆、绩溪会馆，等等。这些县籍同乡会馆的产生，说明这些城镇中歙县、休宁、绩溪的商人与移民已经众多。据《歙县馆录》记载，明嘉靖四十年(1561)，因“歙人辐辏都下，以千万计”，“捐资创会馆以联属之”。

(3)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的社会组织。徽州商人大都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结伙经商。因此，明代中期以后，徽州移民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宗族。为了尊祖、敬宗、收族(或曰“睦族”)，他们一是在异地他乡纂修谱牒，如《歙县迁苏潘氏家谱》《新安迁通孙氏家乘》《吴氏自徽迁润宗谱》《黄氏自徽迁润宗谱》《月潭朱氏重修迁浙支谱》以及吴县《大佛潘氏支谱》、苏州《大阜潘氏支谱》、常州《大阜潘氏支谱》等等；二是在异地他乡修建祠堂，如歙县吴氏移民修建吴氏润州祠堂[4]，徽州汪氏移民修建扬州汪氏宗祠[5]，徽州程氏移民修建江夏程氏宗祠[6]，歙县方氏移民修建广陵方氏宗祠[7]，徽州程氏无为移民修建无为“目耕楼宗祠”[8]，歙县岩镇郑氏移民修建江宁郑氏宗祠、扬州“亲乐堂”，“子姓以时奉祭祀”[9]，等等。徽州移民在全国各地修纂谱牒、修建祠堂，说明这些城镇徽州移民众多，他们在异地他乡形成“新宗族”。

据历史文献记载，明清时期徽州在全国各地的移民众多。汪道昆说:“新都业贾者什七八，族为贾而隽为儒，因地趋时，则男子所有事。”[10]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11]陈去病《五石脂》记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而以汪、程为最著，支祠以数千计。……且其俗重商，四出行贾，多留不返。故东南郡国巨族，往往推本于歙，固不特汪、程二氏已也。”

明清时期，全国各地许多城镇徽州移民非常多。扬州当铺没有当地人开办的，全部都是徽州“诸贾擅其利，坐得子钱”[12]。泰兴当铺“多新安贾人为之，邑内五城门及各镇皆有”[13]。明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清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十”[14]。汉口不但建有新安会馆、新安书院，而且徽州移民聚居区还被当地人称为“新安巷”；在徽商开设店铺集中的地方形成新安市场，长江沿岸有以徽州命名的“新安码头”[15]。武穴有黟县南屏叶氏宗族移民聚居和开设店铺集中的“叶半街”[16]。景德镇黟县移民特别多，黟县方言可以在市面通用。黟县西递明经胡氏宗族子弟侨居景德镇者众多，他们在景德镇还组建一个宗族组织———明经会，每年都举行各种宗族活动[17]。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8]。陈去病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19]从《扬州画舫录》来看，明清时期扬州是徽州移民特别多的一个城市。

徽州移民聚居的城镇都是手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尤其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从“万山回环”的徽州山区来到辽阔肥沃的平原，从徽州农村来到繁华热闹的城镇，徽州移民走进一个新的世界。徽州人向全国各地迁徙的过程，就是徽州第二条育才道路产生的过程。

二、徽州移民在异地他乡培育的进士和官宦

徽州移民无论走到哪里，都念念不忘金榜题名、冠饰簪缨、位列朝堂、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人生最高追求。他们在异地他乡设家塾，建书院，并利用当地府学和县学，培养了大量人才。

明清时期，徽州移民在历科的科举考试中，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现在，我们虽然还很难准确统计徽州移民在异地他乡培育了多少进士，但是，以清代歙县移民在异地他乡的进士为例，可以管中窥豹，看到一斑。

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清代歙县进士计 295 人，其中本籍 125 人、寄籍 170 人。寄籍之中，浙江 16 人，河南 3 人，江西、湖广各 2 人，湖南、云南、贵州各 1 人，仪征 19 人，钱塘 14 人，江都 11 人，吴县、仁和各 8 人，昆山 6 人，杭州 5 人，江宁、甘泉、镇洋各 4 人，上元、扬州、溧阳、繁昌、宜兴各 3 人，嘉兴、丹徒、桐城、武进、临川、上海、安东、元和、芜湖、青浦、全椒各 2 人，于潜、泾县、山阴、常山、宣城、黄岩、常熟、乌程、定海、西安、淮安、高邮、如皋、沭阳、无锡、山阳、荆溪、余杭、阳湖、和州、广德、怀宁、六安、合肥各 1 人[20]。产生于异地他乡的进士约占歙县进士总数的 57%。

在清代歙县进士当中，寄籍异地他乡名列前茅的进士也不少。

状元。歙县状元计 5 人。本籍 2 人，即乾隆壬辰科金榜，嘉庆己巳科洪莹。寄籍 3 人:顺治己亥科徐元文，寄籍昆山；乾隆癸丑科潘世恩，寄籍吴县；同治戊辰科洪钧，寄籍吴县。产生于异地他乡的状元占 60%。

榜眼。歙县榜眼计 2 人，全部都是寄籍。他们是:乾隆庚子科江德量，寄籍仪征；乾隆庚戌科洪亮吉，寄籍阳湖。

探花。歙县探花计 8 人。本籍只有 2 人，即雍正甲辰科汪德容、乾隆庚子科程昌期。寄籍多达 6 人，占 75%，他们是:康熙乙丑科黄梦麟，寄籍溧阳；乾隆戊辰科汪廷屿，寄籍镇洋；乾隆辛丑科汪学金，寄籍镇洋；乾隆乙卯科潘世璜，寄籍吴县；道光庚戌科谢增，寄籍仪征；咸丰壬子科潘祖荫，寄籍吴县。

传胪。歙县传胪计 5 人。本籍只有 1 人，即乾隆庚辰科曹文埴。寄籍 4 人，占 80%，他们是:乾隆甲戌科汪永锡，寄籍钱塘；乾隆辛巳科蒋雍植，寄籍怀宁；嘉庆己未科程国仁，寄籍河南；光绪甲午科吴筠孙，寄籍仪征[21]。

据统计，清代徽州状元计有 19 人。本籍只有 3 人，即乾隆壬辰科金榜、乾隆乙未科吴锡龄、嘉庆己巳科洪莹。寄籍多达 16 人，占总数的 84．2%。除前述徐元文、潘世恩、洪钧 3 人外，其余 13 人是:康熙辛未科戴有琪，寄籍娄县；康熙庚辰科汪绎，寄籍常熟；康熙戊戌科汪应铨，寄籍常熟；乾隆丙辰科金德瑛，寄籍仁和；乾隆庚辰科毕沅，寄籍镇洋；乾隆辛卯科黄轩，流寓苏州；乾隆戊戌科戴衢亨，寄籍大庾；乾隆庚子科汪如洋，寄籍秀水；乾隆乙卯科王以衔，寄籍归安；嘉庆戊辰科吴信中，寄籍吴县；道光壬午科戴兰芬，寄籍天长；道光癸巳科汪鸣相，寄籍彭泽；光绪庚辰科黄思永，寄籍江宁[22]。

明清时期，从徽州迁徙全国各地的移民之中，还产生了众多显宦。现在我们虽然很难准确统计徽州移民在异地他乡培育了多少显宦，但以清代歙县移民在异地他乡产生的京官为例，可以管中窥豹。据北京歙县会馆观光堂题名榜，清代歙县移民在异地他乡产生的京官，情况如下:

大学士。歙县大学士计 4 人。本籍只有 1 人，即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寄籍 3 人: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寄籍昆山；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程景伊，寄籍武进；道光朝体仁阁大学士潘世恩，寄籍吴县。

尚书。歙县尚书计 7 人。本籍 3 人，即户部尚书曹文埴，吏部尚书曹振镛，礼部尚书吴椿。寄籍 4 人，他们是户部尚书徐元文、刑部尚书徐乾学(寄籍昆山)、吏部尚书程景伊、吏部尚书潘世恩，占总数的 57%。

侍郎。歙县侍郎计 21 人。本籍只有 7 人，即吏部左侍郎曹城，刑部左侍郎金应琦，工部右侍郎鲍桂星，工部左侍郎程祖洛，工部左侍郎吴椿，户部右侍郎程恩泽，吏部右侍郎王茂荫。寄籍多达 14 人，占总数的 66．66%。他们是:吏部右侍郎徐秉义，寄籍昆山；工部左侍郎阮尔询，寄籍宣城；户部左侍郎李俊［绂］，寄籍临川[23]；吏部左侍郎凌如焕，寄籍上海；兵部左侍郎胡宝瑔，寄籍松江；礼部左侍郎谢溶生，寄籍仪征；工部左侍郎汪廷屿，寄籍镇洋；兵部左侍郎江兰，寄籍甘泉；刑部左侍郎程国仁，寄籍河南；礼部右侍郎吴文镕，寄籍仪征；吏部左侍郎潘曾莹，寄籍吴县；户部左侍郎汪元方，寄籍余杭；工部左侍郎潘祖荫，寄籍吴县；工部右侍郎鲍源深，寄籍和州。

都察院都御史。歙县都察院都御史计 7 人。本籍 3 人，即曹文埴、曹振镛、吴椿。寄籍 4 人，他们是徐乾学、程景伊、潘世恩、汪元方，占总数的 57%。

内阁学士。歙县内阁学士计 15 人。本籍只有 4 人，即曹城、曹振镛、鲍桂星、程恩泽。寄籍多达 11 人，占总数的 73．3%。他们是:徐元文、徐乾学、徐秉义、李绂、凌如焕、程景伊、谢溶生、汪廷屿、潘世恩、吴文镕、潘曾莹[24]。

据历史文献记载，清代徽州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计有 9 人。本籍只有 1 人，即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其余 8 人均为寄籍，他们是: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吴正治，寄籍江夏；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徐元文；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程景伊；乾隆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潘世恩；乾隆朝协办大学士汪由敦，寄籍钱塘；嘉庆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戴衢亨；嘉庆朝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戴均元，寄籍大庾；光绪朝军机大臣潘祖荫[25]。产生于异地他乡的大学士和军机大臣占 88．88%。

三、徽州移民在异地他乡培育的富商大贾

科第仕宦是徽州移民子弟的最高人生追求，但是，这是一条非常狭窄的人生道路。在科举考试中，能够金榜题名者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学子都是“屡试不售”，名落孙山，冠饰簪缨、位列朝堂的理想不能实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移民科考失败的学子提供了一条金光大道。于是，他们与时俱进，纷纷“弃儒服贾”，投身于商业活动，在商海之中大显身手。

明清时期，徽州移民在异地他乡产生了众多富商大贾。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侨居异地他乡的徽州富商大贾有:江春，寄籍仪征；汪廷璋，寄籍扬州；黄晟、黄履暹、黄履昊、黄履昂，“寓居扬州”，人称“四元宝”；马曰琯、马曰璐，侨居扬州，经营盐业，成为巨富，人称“扬州二马”；鲍志道、鲍漱芳，“业鹺淮南，遂家于扬州”；方士庶、方士“业盐淮南，居扬州”；徐赞侯，“业盐扬州”，遂家于扬；郑钟山、郑鉴元，“业盐淮南”，家于仪征；吴尊德，“世业盐法”，“寓居扬州”；郑景濂，“始迁扬州，盐策起家”；汪应庚，“业盐扬州，遂籍江都”……

据历史文献记载，侨居异地他乡的徽州富商大贾还有:吴鹏翔，“侨寓汉阳”[26]；程德成，“(寄)居沪上”[27]；江承东，“侨居邗江”[28]；汪允俶，侨居扬州[29]；程壁，“侨居江阴”[30]；汪文德，客居维扬[31]；吴绍浣，“侨居扬州”[32]；汪日章，寄籍仁和[33]；汪一麟(又名文征)，寄籍淮扬[34]；汪廷俊，“侨寓钱塘”[35]；汪焘，“侨居维扬”[36]；江承联，生金陵，迁真州，事盐策，家业日起[37]；叶道传，“寄籍仁和”，“隐盐业中”[38]；胡光墉，寄籍仁和，钦赏穿黄马褂的“红顶商人”[39]，等等。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记载:

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江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

李澄在《淮鹺备要》中说:“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赀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40]王赠芳在《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中亦说:淮南盐商“向来商力充裕，办运者百数十家，有挟资至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41]。乾隆三十七年(1772)，户部库存银 7800 余万两[42]。而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州盐商与晋商共“百数十户，畜赀以七八千万计”，与国库存银数

目相等[43]。

明清时期，徽州移民富商大贾，富埒王侯。总商汪廷璋，“自其先世大千迁扬州，以盐策起家，甲第为淮南之冠，人谓其族为‘铁门限’(按:来访请益者多———引者)。父交如……守财帛，富至千万”[44]。总商江春，“每遇灾赈、河工、军需，百万之费，指顾立办”[45]。乾隆南巡至扬州，江春“承办一切供应”。他在扬州有五处园林。一日，乾隆“幸大虹园，至一处，顾左右曰:‘此处颇似南海之琼岛春阴，惜无塔耳。’江闻之，亟以万金贿近侍，图塔状。既得图，乃鸠工庀材，一夜而成。次日，高宗又幸园，见塔巍然，大异之，以为伪也。即之，果砖石所成，询知其故，叹曰:‘盐商之财力伟哉。’”[46]乾隆南巡，建行宫于扬州天宁寺，时临小金山。“山在水中，象京口金山。”遥视数里外，“见城楼一角，近视则无物，上意憾焉”。歙县侨居盐商黄氏妇人闻之，“即日就桑园隙地建大屋，鸠工庀材，一夕成”。次日，乾隆“瞥见之，惊问近侍曰:‘何其速焉?’近侍以黄氏妇所造。上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47]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高宗南巡遗闻五则》记载:

扬州之富，以淮南盐商名。商之著者凡八家，而黄氏妇(按:歙县移民———引者)居其最。高宗之幸郡也，诸商皆争自输金为御供，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故上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车驾还京后，有皇子晏起以误读，上责之曰:“汝欲逸乐，何不作淮南商人子，而必生吾家耶!”

徽州移民产生的富商大贾，大都“贾而好儒”。他们“虽为贾者，咸近士风”[48]。明清时期，“两淮殷富，程氏(按:歙县移民———引者)尤豪侈，多畜声伎狗马”。大盐商程晋芳“独愔愔好儒，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多闻博学之士，与共讨论”[49]。自陈平生所学，“诗第一，古文第二，经解在外”。袁简斋赠诗曰:“束发愔愔便苦吟，白头才许入词林。平生绝学都探遍，第一诗功海样深。”[50]大盐商汪廷璋，“喜读经史，论衡古今，虽硕儒老宿，咸称其当”。“平生无他嗜好，惟性耽吟咏以适。”“其作诗豪迈俊逸，一轨于法。”[51]总商江春，“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马秋玉“下世”，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居扬州南河下街，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著《水南花墅吟稿》[[52]。

在扬州这个徽州移民聚居的城市，徽州富商大贾还办有“诗文之会”。其中，以歙县程氏富商大贾创办的筱园诗文之会、歙县郑氏富商大贾创办的休园诗文之会和祁门马氏富商大贾创办的小玲珑山馆诗文之会“最盛”。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会期，于园中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53]。

四、结语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新的社会胚胎在封建社会母体之中孕育。这种经济现象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已开始走向解体的前夜。徽州人打破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历史传统，游四方，闯天下，大规模地向全国各地迁徙，开辟第二条育才道路。他们在异地他乡重教崇文，培育人才。这是历史的潮流，时代的呼唤。

徽州移民在异地他乡培育人才，不论对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还是对徽州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虽然身处异地他乡，但是不忘桑梓，不但亲身参加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而且还大力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

注释：

[1]黄元豹: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5《祖墓》，清雍正九年刻本，第5页下。

[2]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13《白庵程翁八十寿序》，“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88页。

[3]李乔岱:万历《休宁县志》卷1《风俗》，万历三十五年刻本，第11页。

[4]吴兆麒:《吴氏自徽迁润宗谱》卷4《润州始建祠堂记》，光绪十九年敦厚堂刊本，第1页。

[5]汪舸:歙县《汪氏谱乘》卷3《汪氏宗祠建修始末》，清乾隆抄本，第129～140页。

[6]章学诚:《章氏遗书》卷30，吴兴刘氏嘉业堂木活字本，第47页上。

[7]许承尧:民国《歙县志》卷9《义行·方士传》，徽州旅沪同乡会印本，1937年铅印本，第40页下～41页上。

[8]参见王振忠《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54～56页。

[9]许承尧:《歙事闲谭》卷25《郑鉴元》，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883页。

[10]汪道昆:《太函集》(第1册)卷17《阜成篇》，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72页。

[11]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叙》，《四库全书》集部219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0～1292页。

[12]杨洵等:万历《扬州府志》卷20《风物志·风俗》，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第5页。

[13]钱见隆、吴朴:康熙《泰兴县志》卷1《风俗》，抄本。

[14]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北京歙县义庄》，第357页。

[15]许登瀛:《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观察蘧园公事实》，清乾隆二年刻本，第17页。

[16]赵华富:《古风犹存的徽州名宗右族———黟县南屏叶氏宗族调查研究报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5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2页。

[17]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黟县志·商业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319页；胡仲愚:《旅景西递人》，《徽学通讯》1995年4月，第53～57页。

[18]谢肇淛:《五杂俎》卷14《事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13页。

[19]陈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6页。

[20]据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清代歙京官及科第》(第348～355页)统计。按:《歙事闲谭》将洪亮吉记为本籍，讹。据民国

《歙县志·义行》，洪亮吉寄籍阳湖。

[21]以上均据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清代歙京官及科第》，第348～355页。按，嘉庆己巳科洪莹，《歙事闲谭》作“嘉庆乙巳

科洪莹”；乾隆戊辰科汪廷屿，《歙事闲谭》作“汪建玙”，均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改。

[22]参见吴建华《清代徽州状元》，《徽学通讯》1989年第1期增卷；赵华富《论明清徽州社会的繁荣》，《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汪顺生《中国第一状元县》，《徽州学研究》第3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1～155页。

[23]据《清史稿》记载，歙县有户部左侍郎李绂，没有户部左侍郎李俊，李俊可能是李绂之讹。

[24]以上均据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1《清代歙京官及科第》，第348～355页。按:吴文镕，《歙事闲谭》作“吴文溶”，讹，据《清

史稿》改。

[25]参见《清史稿》有关传记、《歙事闲谭》卷11《清代歙京官及科第》；叶榆荪《人物史料一束》，《徽学通讯》1988年第2期。

[26]何应松、方崇鼎:道光《休宁县志》卷15《人物·乡善·吴鹏翔传》，清道光三年刻本，第82页上。

[27]许承尧: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程德成传》，第88页上。

[28]许承尧: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江承东传》，第30页上。

[29]许承尧: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汪允俶传》，第78页上。

[30]邵棠:《徽志补遗》，清嘉庆十九年寄蜉草堂刻本，第23页上。

[31]周溶、汪韵珊:同治《祁门县志》卷30《人物·义行·汪文德传》，同治十二年刊本，第5页下。

[32]吴吉祜:歙县《丰南志》第3册《人物·士林》，抄本，第24页上。

[33]吴甸华等:嘉庆《黟县志》卷7《人物·尚义·汪日章传》，同治九年刊本，第17页下。

[34]汪澍、汪逢年:《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处士一麟公墓志铭》，清顺治九年刻本，第10页上。

[35]吴甸华等:嘉庆《黟县志》卷7《人物·尚义·汪廷俊传》，第1页下。

[36]汪舸:歙县《汪氏谱乘·式溪汪君传》，清乾隆抄本，第116页。

[37]《歙东竦源济阳江氏族谱》卷9《岌公派传·清太学生承联公传》，序文残缺，版本不明。

[38]许承尧: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叶道传传》，第82页。

[39]丁丙等:光绪《杭州府志》卷134《义行三》，1922年铅印本，第24页；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第32章《人

物·胡光墉传》，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877页。

[40]李澄辑:《淮鹺备要》卷7，清道光三年刊本，第1页上。

[41]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2，“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5548页。

[42]《清实录》第20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20，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癸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2页上。

[43]汪喜荀:《从政录》卷2《姚司马德政图叙》，江都汪氏丛书重印本。

[44]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5《冈西录》，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

[45]铁保: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二·才略》，扬州书局同治九年重刻本，第15页下。

[46]徐珂:《清稗类钞》第1册《园林类·大虹园之塔》，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6～207页。

[47]汤殿三:《国朝遗事纪闻》第1册《高宗南巡遗闻五则》，民兴报馆清宣统二年刊本，转引自杨德家《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

初辑》，《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3页。

[48]戴震:《戴东原集》卷12《戴节妇家传》，“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82页。

[49]昭槤:《啸亭杂录》卷9《程鱼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95页。

[50]许承尧:《歙事闲谭》卷3《程鱼门〈刘姬行〉》，第70～72页。

[51]汪舸:歙县《汪氏谱乘·奉宸苑卿汪君事实》，清乾隆抄本，第111～112页。

[5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2《桥东录》，第296～297页。

[53]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城西录》，第187页。